

许美德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焦点及启示

黄成亮

(南京工程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南京 211167)

【摘要】 加拿大学者 Ruth Hayhoe(中文名为许美德)通过四十余年的广泛研究,把中国高等教育向世界推介,为西方学者了解和关注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桥梁和窗口。在不同时期,许美德先后关注中国书面语改革和课程现代化、主张在国际合作中倾听中国声音、聚焦中国大学近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等,把中国教育家和大学承载的文化特色介绍给全世界。许美德的研究,为中国大学更加自信地参与文明对话、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构建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新模式、理性看待西方学者学术观点,提供了镜鉴之思。

【关键词】 许美德;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合作;中国大学近代化;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章编号】** 1003-8418(2019)12-0001-0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36/j.cnki.jshe.2019.12.001

【作者简介】 黄成亮(1979—),男,辽宁铁岭人,南京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博士。

一、问题的提出

著名比较教育学家、加拿大学者 Ruth Hayhoe(中文名:许美德),四十多年来长期关注中国高等教育,足迹遍布两百多所中国大学,源于生活体验、“解释”而非“批评”、“文化”而非政治和经济的视角,向西方学术界和公众介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爱德蒙·金认为:“许美德在不同的人生经历中,在中国各地担任过教师、教授和大学领导人,不仅精通普通话和广东话,更是一位通晓多种语言、感受多种不同文化的阐释家。”^[1]

许美德在中学时开始学习拉丁语、法语和德语以及希腊语。高中毕业后,进入多伦多大学古典文学系学习。1967年7月大学毕业以后,许美德来到香港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任教,一直到1978年远赴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继续深造。1979年9月起,许美德师从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布赖恩·霍姆斯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她选择20世纪中国与西方的学术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在1980年2月到1982年3月期间,许美德以外籍专家的身份到复旦大学任教,并继续开展研究。

1984年博士毕业之后,许美德回到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中国大学和门户开放》是许美德两年博士后研究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在此期间,她曾参加世界银行的一项咨询工作。1989年到1991年,许美德从多伦多大学借调到加拿大驻华使馆出任文化参赞,她发起和促进了中加两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活动。1991年6月,许美德婉拒了大使馆请她继续工作的邀请,回到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继续工作。1997年10月,许美德教授在香港教育学院开始了为期四年半的校长生涯。卸任后许美德继续她在多伦多大学的教职,并在中国多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继续在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和东西方文明对话领域笔耕不辍。四十余年来,许美德与不同地域和年龄段的中国教育家群体广泛交往,通过一系列思想深刻、见解独到的著作和文章,把中国大学的变革与发展介绍给西方的公众和学术界。在《中外比较教育史》《中国大学与对外开放》《教育和现代化 中国的经验》《东西方大学与文化》《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与高等教育》《圆满:一个加拿大学者的中国情愫》《思想肖像:中国知

名教育家的故事》《21 世纪中国大学肖像:走向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等著作中,许美德把中国高等教育全方位地介绍给了世界。

许美德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焦点,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先后关注中国教师角色变化、书面语改革和课程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在国际合作中的诉求,许美德在学术生涯最初十年最关心如何避免西方与中国共同开展的合作过程中“先入为主”。第二阶段,许美德走出了对儒家思想认识的误区,回归对儒家文化理性和全面的认识,感受“冷战”结束后“文明对话”时代的到来。第三个阶段,从研究中国文化特性到分析中国教育家群体的学术精神,在文明对话的视角下,向世界介绍中国教育家和大学精神。

二、关注中国课程现代化以及教师角色转化

1. 书面语改革和课程现代化。许美德本人精通多种语言,一方面对不同语言背后的文化动力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把握,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社会中语言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在 1979 年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中,许美德对中国、日本和土耳其三国书面语的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许美德认为,中国语言并未因方言的激增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因而在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和几千英里的空间跨度中,汉语依然表现为有力的文化整体^[2]。许美德明确指出,对中国而言,书面语改革,是课程现代化的关键议题。1976 年以来,中国不断重复宣传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四化”建设。学校课程改革中的文字现代化自然成了推动实践层面社会改革的重要因素。简体字既能够使得中国人民对自己传统文字和古典文化的热爱得到体现,又能够使得三四千年的文字发展得以延续。

2. 教师角色的变化。许美德认为,中国教师先后经历了儒家模式、日本模式、美国模式、苏联模式和实用模式。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教师角色的变迁》^[3]一文中,许美德指出:任何社会中的教师角色,都会受到当前经济形势、政治认同以及教育使命内在复杂性的共同影响。通过系统研究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教师角色的不断变化,许美德认为中国的教师角色主要经历了以下几种模式的逐渐更替:

儒家模式:传统的教师形象。1903 年之前,除了极个别面临严峻挑战的时期,整个中国的教育都是通过儒家经典和严格的科举考试来传承和检验的,通过这种方式选拔少数社会精英进入统治阶层。普通教师通常由科举考试中某一阶段止步的书生担任。教师们成了一个衰败的社会中,保存和传播传统文化以及古代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和媒介。

日本模式:改革者的教师形象。在 1911 年,经由深受日本影响的中国改革者引入。在此期间,大约有一万五千名学生东渡日本接受高等教育,其中大部分回国担任教职。同时,中国创办了 8 所高等师范学堂,并且之后全部进入了中国知名大学的行列。教师史无前例地成为来自日本和西方的“新学”媒介,并且成为“新思潮”的主要来源,在形塑当时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美国模式:爱国者形象的教师。随着对日本幻想的破灭,以及 1919 至 1921 年约翰·杜威访华,美国六三三学制引入中国。这种学制一直延续到 1966 年。杜威的教育思想得到了其具有留美经历的追随者不遗余力的宣传。当时,曾寄厚望于杜威倡导的生活教育,希望藉此能为推动社会民主化打下稳定的基础。然而,这种想法没有来得及实现,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以及军事训练在学校中占据优势地位。教师扮演着爱国者的角色,通过教育青年人来实现为国家服务的使命。

苏联模式:专家型教师。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规模得到迅速发展。附加在美国六三三模式之上的是两种相互冲突的教育模式:以选拔和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需人才的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以及毛泽东在延安创办的革命教育模式。苏联模式中教师首先扮演专家的角色。教师享有高度的权威性,所传播的知识通常依赖翻译苏联的教科书,这些知识并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的形势和需要。为了确保学术水平,教师们通过严格的升学考试,来选拔继续深造和上大学的人选。

实用模式:折衷的教师。1978 年 4 月召开了 1971 年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教育会议。会上总结并确认了实用教育模式在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中的作用。许美德指出,在这

种高度实用的模式中,教师角色至关重要。不再像过去那样过分强调向工农学习,而是不遗余力地提高学术水准,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主张在国际合作中倾听中国声音

在参与对华合作项目的过程中,许美德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惯性思维,主张在国际合作教育项目中,反思价值中立问题,注重公平合作,倾听中国的需求和声音。

1.反思价值中立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许美德认为,中欧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继续开展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合作顺理成章。在她看来,“对比较教育学家而言,此时最大的兴趣在于,探讨怎样的文化贡献会有利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4]。

1983年,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启动了一系列加中之间的大学合作项目。1984年许美德回到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时,她为两个项目评估工作提供咨询服务。在这个过程中,许美德开始反思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中立”问题。“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合作当然不能脱离与政治和经济关系,但是如果简单地认为教育、科学和文化间的合作由政治和经济关系决定,也是言过其实的。”^[5]通过研究相关国家以往合作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她认为,教育、科技和文化领域合作的结果,有时候会超过或偏离政治家们的美好预期。

许美德在对近代以来中国和工业化国家之间文化教育交流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入考察和研究之后,十分直率而尖锐地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希望看到一个和当前的国际现状相吻合因此被促进这种吻合的教育价值和模式所渗透的中国?还是准备冒一下险,宁愿看到一个会给世界大家庭带来某种新鲜的独特的东西,在世界政治上起改造作用的中国?”^[6]

许美德指出,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东西方交流,包含着很多不同领域和层次的合作。在《中欧间的教育、科技与文化关系》一文中,许美德从不同层面的教育合作协议、机构之间的联系、中欧间学者与学生流动情况入手,分析了中国大学在

双边和多边合作中的得失^[7]。欧洲大学对中国大学课程领域的影响,折射出合作中教育和社会价值的力量。在她看来,中欧之间大学的交流与合作,科学与技术是课程体系中的重点。

2.公平比效率更重要。在许美德看来,根据纵向历史研究方法的基本假设,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进步,跟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并无二致。教育和科技交流将会有助于中国克服困难,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对外交流过程中的文化价值转换,可能会成为推动中国取得进步的“催化剂”,也可能成为强化中国传统文化中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相关内容的“绊脚石”。许美德致力于探讨西方对华援助项目中比效率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她看来,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等机构有责任去挖掘效率背后的支撑,这关系到中国大学援助项目长久发展的根本。她非常关注这些援助项目是真的提高了中国大学参与社会发展以及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进而推动知识的全球转化,还是仅仅促使中国大学服务于西方的短期利益。

许美德认为,要想追溯和理解西方对华大学援助项目如何能够真正有利于中国,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方面,要理解中国大学近代化初期所采用的学术自由和自治观念在中国的学术传统语境下的真正含义,而不能简单地与欧洲和美国大学中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做对比。另一方面,还要弄清楚中国大学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地位如何,这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8]

许美德坚信,工业国家对华文化和教育政策有两个来源:一是五花八门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国家文化政策的制订是考虑到这些目标的。二是教育历史和传统文化,这也是决定政策的最重要因素,尽管它不那么明显地被意识到^[9]。

在《渗透还是互利?中国与欧洲、日本和北美的教育合作》一文中,许美德指出,目前中国和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正在努力回归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这个体系很大程度上被OECD的西方成员国主导。中国希望派出更多的学生和学者,到西方国家的大学中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来追赶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10]。

许美德关注到,“中国对外教育交流过程中不

断反复出现的两种思想。一种思想认为:来自其他文明的影响,有造成道德感淡薄、政治上又受人影响的危险;另一种思想则认为:可以而且应该对其他的文明逐一区别,将经过事先审定、可以丰富中国文明的成分有选择地吸收过来”^[11]。

在分析 OECD 国家开展对华高等教育合作的动机时许美德指出:“就西欧国家与日本而论,主要的动机似乎是经济的,而美国可能在利用机会教育下一代中国的领导人才上下有最高的政治赌注。”^[12]

许美德主张,在国际合作中倾听中国的声音,关注中外合作项目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作为一个研究者,她没有在学术活动中渗透任何与利益和价值观相关的影响因素,而是客观地站在中西方合作利益纠葛的圈外,避免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先入为主。同时,许美德提醒中国学者群体注意,分析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背后深层次的利益得失,从而能够在参与对外合作的过程中全面审视效率与公平,这对于改革开放之初,如何在急于争取国际支持和参与国际交流的迫切和匆忙中保持必要的清醒,是十分关键的。

四、文明冲突与对话交织的中国大学近代化之路

许美德通过中西方大学模式的比较,以及与中国部分教育家的深度交往,结合走进中国两百多所大学的研究所得,分析了中国大学的近代化之路。

1. 中国大学近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许美德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重点关注了教会学校对中国大学近代化的影响。在《中国的大学和西方学院模式》中,她探讨了由外国引进的学院模式对强化儒家思想体系在政治上的控制影响,指出“法国耶稣会引进的学校模式与儒家学说相吻合,而美国传教士引进的美国模式正好相悖”^[13]。许美德也指出了在大学模式选择上,中国学者和思想家的自主性。“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大学模式是由中国的思想家们自己选择的,而不是由西方传教士们引进的,而且这个模式对中国学术方面改革的影响比起其他外国模式来要大得多。”^[14]

在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状况做了一个大致的综述后,许美德认为,“在这

一历史时期,中国对于西方大学的教育思想采取了折衷的办法,西方的学术自由和自治经过了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作用和适应以后,最终变成了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知识自由’和‘社会责任’思想。中国的大学已经逐渐发展成熟,它在保持中国的传统特色和与世界大学制度相互接轨这两者之间已经成功地找到平衡点”^[15]。

在《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中,她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中国教育与社会变迁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一方面,考察 20 世纪中国高等教育领域里的重大改革与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社会发展趋势的联系;另一方面,分析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对确立改革基本原则的影响。她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呈现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正是这两种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16]。

2. 中国教育家承载的传统文化。早在 1987 年,许美德就在《中国教育家论本国教育》一文中关注到了西方学者的看法,“西方缺乏倾听中国教育家声音的渠道,有限的学术期刊选编翻译的关于中国教育家观点的文章,都是西方学者从中国政治素材中精挑细选出来的”^[17]。在《现代中国的精神》中,许美德用教育叙事的方法把西北师范大学的老校长李秉德教授、华中理工大学的老校长朱九思教授、复旦大学的老校长谢希德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潘懋元教授、北京大学的原教务长汪永铨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鲁洁教授 6 位中国当代教育家的生活故事展现出来,与读者分享教育家的成长历程,以此总结 20 世纪中国社会与教育变迁的规律。在 2008 年 6 月出版的凝聚许美德教授数年心血的著作《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中,除前述六位外,又增加了 5 位著名教育家,他(她)们是:华东师范大学的老校长刘佛年教授,杭州大学原教育系主任王承绪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顾明远教授,东北师范大学的王逢贤教授和原华东师大副校长叶澜教授。许美德教授对中国教育家的研究时间跨度之大,所述教育家所在学校的地域分布之广,以及对教育家们了解的深入和真切程度,在当代西方学者中可以说绝无仅有。

“这些知名教育家在现代中国的生活经历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终其一生,他们的名字是和一所

大学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的个人叙事便与其所在的学府的叙事长时间地交织在一起。”^[18]许美德教授对中国教育家的研究,以20世纪中国的时代变迁和教育家不同人生阶段的生活轨迹为背景,从教育家对经历过的生活困境的积极态度和从未放弃的学术追求,尤其是教育家们都把毕生的经历献给了自己大学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历程的分析中,总结儒家文化对教育家的深刻影响和在教育家身上的不同表现方式。

3.走向大众化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在香港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2011年出版的著作《21世纪中国大学肖像:走向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中,许美德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在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基金的资助下,深入研究了大学在21世纪初的大众化进程中发生的重要转型^[19]。自2005年秋开始,许美德及其团队持续深入地研究了1990年至2005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生的变革。

许美德非常关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关心中国大学如何立足自身文明土壤和学术传统谋求在世界舞台上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对中国大学的多样性产生怎样的影响,并在研究中探讨了中国大学如何保证学生入学机会均等一系列问题。课题组所选12所大学分别是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延边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科技大学、西安外事学院、蓝天学院。课题组研究着眼点在于“究竟哪些中国大学将可能对世界高等教育做出文化上的贡献”,因此决定重点关注顶尖的大学。地理位置和学校类型也是许美德和课题组选择案例的重要影响因素,学者们希望能够确保所选的12所高校覆盖中国的主要地区。他们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其中主要的沿海地区发展最快。根据中国国情,地理位置对于高校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不同地区经济拥有完全不同的经济条件和独特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许美德课题组力求所选的研究案例能够代表主要类型的高等院校。因此,她(他)们选择了几所主要的综合性大学,两所科技大学,一所农林大学,科技大学和农林大学是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出现的^[20]。同时,课题组还

选择了一所师范大学,以及一所主要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大学。许美德指出,在研究的过程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发现是:中国学者和研究者通过自身以及国家重点资助的研究项目,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表明了在中国社会中久负盛名的“实业型学者”(establishment scholars)模式的持续存在,他们通过提供知识和经验直接服务于社会,类似于传统中国的学者官员角色。

五、中国大学理性发展的镜鉴之思

许美德教授在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上所坚持的远见卓识,对于西方世界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高等教育的经验与价值,以及激励中国学者反思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求索中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可行路径方面,具有启发意义和价值。

1.基于文化自信构建中国大学模式和大学精神。许美德指出,“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需要用全新的方法看待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应最先关注知识主题的讨论。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对改革开放后大量知识流入做出反应。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如何使外来知识适应中国文化、政治特点、经济需要,对于改革开放政策的长期成功至关重要”^[21]。并早在1984年,许美德在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就以《德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的大学模式以及对1911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评价》为题,对大学模式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且从大学精神的角度,对中国大学的发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为了形成一种中国大学精神并使其为世界学术界带来一股活力,中国大学领导人必须加强对中国历史、哲学、医学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从而把自己无与伦比的学术遗产与在西方模式下进行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前沿研究联系起来。”^[22]

“许美德教授把大学的模式追溯到大学发展的源头上,分析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大学发展的模式不同,大学的价值观不同。这就提醒我们,在研究和规划大学的发展时,不能忽视民族传统文化对大学的张力。”^[23]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这是探索中国大学模式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这是

构建中国大学模式的经济保障。国家层面对“文化自信”的重视,是构建中国大学模式、弘扬中国大学精神的宝贵机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强对中国传统书院模式的研究,挖掘中国大学模式的文化和历史原型,以促进文明多样性和引领中国大学更好发展为出发点,勾勒中国大学模式蓝图,是中国大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步骤。

2. 基于相互了解和充分尊重构建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新模式。当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日益深化,只有充分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和教育传统,才能实现合作的持久和双赢。“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精神动力站,居然有着这么多宝贵的历史文化和思想!但是很可惜,这些宝藏西方世界却不为人所知。我就思考,我要成为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24]许美德对中国大学的深入研究,是建立在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以及西方大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模式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的。“一个人如果不理解过去不同时代和地点存在的不同的大学概念,就不能真正理解大学”,这是因为“过去的希望、抱负和价值观与现代大学概念紧紧结合在一起,甚至过去的缺陷和不满也体现在现代高等教育结构中。”^[25]作为一名比较教育学者,许美德的研究重点是深化对中国社会教育结构的理解。她认为“与我所属国家的教育相比,中国教育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结构。因而从一开始,比较教育与历史就是研究中国教育必不可少的知识基础。如果不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不了解 20 世纪国外教育与文化对中国的深远影响,便无法理解当代中国的教育模式或结构及其广泛的社会文化渊源”^[26]。

当前,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组织沿线国家的政府官员、大学校长、著名学者开展文明对话,倾听合作者的诉求和声音,需求“双赢”或“多赢”的合作模式,是中国大学和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可为之举。组织中国学者,对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异域文化深入研究,持续关注,尊重差异,才能真正推进高等教育合作向纵深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一时间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在一部分人看来,近代化过程中经历了文化冲突的中国大学,今天也日益从昔日的“模仿者”变成了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示范者”。越是如此,我们越应该清醒,未来

的高度教育合作,应该超越“引领者”和“追随者”的局限,走向尊重文明异质性的“携手同行”。

3. 超越对西方学者学术观点的工具性解读。许美德对中国大学的关注和研究,既分析了过去 100 年来中国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在历史变迁和社会动荡中的命运,也指出了其在借鉴外国模式和保留自身特色方面所面临的文化冲突,还高瞻远瞩地勾画出中国大学未来可能的发展图景。在她看来,未来中国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充分重视大学的“知识分布”“地理分布”和“性别分布”的合理性。对新形势下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人教育的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招生规模与教育质量如何协调的问题等,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许美德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思考,建基于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了解、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感同身受、对中国大学未来发展的殷切期待之上。这种宏观的思考和微观的生活体验,使得许美德的高等教育思想既反映了足够的历史底蕴,又体现了鲜活的时代背景,还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我们需要避免两个极端:一是把中国大学在发展中遇到的某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对应到学者的学术观点上,对于学术探讨的阶段性结论过于依赖,一旦这种工具性解读无法满足其要求,不能针对性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时,我们便会觉得这些学术观点是“坐而论道”,于事无补,因而对其横加指责。二是干脆秉承“拿来主义”,对西方学者的学术观点不加思考地完全认同,甚至盲目地应用于指导自身与西方差异甚大的实际工作。

【参考文献】

- [1] King, E. Review of Ruth Hayhoe, *China's University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e Conflict* [J]. *Comparative Education*, 1999, 41(1): 100.
- [2] R. Hayhoe. *Written Languages Reform and the Modernisation of the Curriculu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Japan and Turkey* [J]. *Canadian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979, 8(2): 14.
- [3] R. Hayhoe. *The Changing Role of Teachers in China: Post-Mao Perspectives* [J]. *British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1979, 5(3): 219—229.
- [4][5][7] Hayhoe. *European—Chinese Relations in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M] // Joyce Kallgren and Denis Simon. *Educational Exchanges: Essays on the Sino—American Experi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East A-

- sian Studies, 1987:167—190.
- [6][9][11] (加)许美德,(法)巴斯蒂.中外比较教育史[M].朱维铮,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435,436,3.
- [8]R. Hayho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Aid and the University: A Chinese Case Study[M]//Cicely Wstson. Governments and Higher Education: The Legitimacy of Intervention. Toronto: Higher Education Group, OISE, 1987:217—218.
- [10]R. Hayhoe. Penetration or Mutuality China's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with Europe, Japan, and North America[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86,30(4): 532—559.
- [12](加)许美德.中国的大学与西方的学院模式[J]//Yazhou daxue de fazhan—cong yilai dao zizhu(From Dependence to Autonomy—Development of Asian Universities).伍振鹭,译.台湾师大师范,1990:64.
- [13][14](加)许美德.中国的大学和西方的学院模式[J].上海高教研究,1991(3):97—102.
- [15][20](加)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许洁英,主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90—91,77—80.
- [16][26]丁刚.中国教育:研究与评[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9.
- [17]Fraser, S. Chinese Communist Education: Records of the First Decade[M].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65.
- Seybolt, Peter. Revolutionary Education in China: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 Press, 1973. Hu Shiming, and Seifman, Eli. Towards a new world outloo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P. R. C. 1949—1976[M]. New York: Ams Press, 1976.
- [18](加)许美德.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M].周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7.
- [19]Ruth Hayhoe, Jun Li, Jing Lin, Qiang Zha. Portraits of 21st Century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Mov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Z].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2011.
- [21]Ruth Hayhoe. China's University and Open Door[M]. M. E. Sharpe, 1989:3.
- [22]Ruth Hayhoe. 追求世界一流——面对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中国大学[J]. 复旦教育论坛, 2005(3):59—65.
- [23]顾明远. 浅谈中西大学价值观之异同[J]. 高等教育研究, 2017(3): 1—3.
- [24]张磊. 学者德性与责任——专访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许美德教授[J]. 比较教育研究, 2017(2):9—13.
- [25](美)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 王承绪,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49.

Central Issue and Value of Ruth Hayhoe'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of China

Huang Chengliang

Abstract: As a famous Canadian distinguished expert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Prof. Ruth Hayhoe (Xu Mei—de as her Chinese name) devoted her past four decades academic life to do long—term and profound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of China. In different periods, Ruth Hayhoe introduced the reform of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and curriculum modernization, calling for the voice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focus on cultural conflict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She interprete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ducators and universities, her research successfully introduced worldly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universities, providing a mirror for Chinese univers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more confidently; it provides a mirro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mode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also a rational view of academic viewpoints of western scholars.

Key words: Ruth Hayho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of China; Central issue and value

(责任编辑 肖地生)